两会,言说的姿态

(上接B01版)

围堵高官 “逼”他们说话

除了“主动说”,更多代表委员是“被动说”。

每年两会开幕,都是围堵部委领导以及明星代表委员的良机。而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那200多米的红地毯区,成了众多媒体守候的位置。

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8时10分,上百个记者已经开始了“红地毯”守候。按照会议新闻组的安排,只有3名记者可以进入大厅通道“请”部长到采访区接受采访。

第一位进入北大厅的是工信部部长苗圩,一名眼尖的记者认出他,跑过去把苗圩拉到了采访区,苗圩走到话筒前笑着对记者们说:“大家好!有什么问题?”立时引来抢先的提问。

之后,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进入北大厅,立即被一名记者拦下,见他不愿说话,大家一起喊:“尚福林,过来聊一下。”他于是“被迫”聊了几句。

而在两天前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唯一走过红地毯被拦下的部长只有卫生部部长陈竺,不到10分钟,陈竺就拱手致歉而去。而在去年政协开幕式,据称陈竺“走错”了门,居然从东门进入,记者们蜂拥而上,一直围堵了20分钟。

一直等待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出现的一台湾媒体记者很失落,她关心的是对台经贸的问题,“我还得找机会去会场堵他。”

“堵”已经成为两会记者口中的常用词,“有些人不堵采访不到,逼他们说话,常用的手段就是围堵。”一位连续7年上会的记者介绍绝招。

除了会场集体围堵外,有些记者还跑到代表委员的驻地去蹲点。只是有时候北京的部委高官并不天天参会,因此往往扑空。

“有一次我为了堵财政部部长,连续在会场守候了两天,最后才等到他,”一位河南的媒体记者说,“只要能堵到他,一般还是能得到提问机会的。”

围堵高官,并非眼光向上看。这位河南记者无奈道:“谁让他们掌握着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有效的话语权呢?”

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俞敏洪认为,他们说话需要很谨慎。“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偶尔说错了就错了,后果没那么严重。部长说的话涉及政府的政策和未来,谨言慎行是可以理解的。”

难开尊口 有的被称“酱油委员”

事实上,即便围堵之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口。飞人刘翔今年再度上演超速“突围”的一幕,全国政协委员韩红对于“微博打拐”一事,任记者怎么逼问都三缄其口。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在开幕大会结束后低头从会场走出,仍被记者认出围堵,但他面带微笑始终不语,最后凭借瘦削灵活的身形突围,小跑而去。不少记者失望道:“怎么经济学家也不说了?”

外地的省级高官也是记者们围堵的目标,但是除了在会场外,其他时间往往都是前呼后拥,有时候来不及靠近,就被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挡驾”了,说领导很忙,以后联系。

记者曾经试图联系东部某省省长,但是连续三次都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把问题写在名片上交给该省代表团一工作人员,但是4天过去了,依然杳无音信。

一位南京某都市报的记者讲述了她采访一高官的经历。“我一直在会场等待休会的时机,不料一直到结束他都没出来,等散会时他出来了,我跟在他身后问了几个问题,他始终不答,直到最后他要上车了,扭头给我三个字:‘不知道’。”

“一般人都采取婉拒的方式,要么说现在没空以后再约,要么说先想想,想好再说。毕竟这是在众多媒体的聚焦之下,不比平时的采访。”她很郁闷地得出结论,“这位领导估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

其实闭口不言的不一定都是所谓的“酱油委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对围追他的记者说:“打死也不说。”但是之后他解释,这是由于提案没整明白,还没正式提交。

“不说的委员有自己的顾虑”,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比如有些媒体喜欢抓住委员的三言两语来炒作,曲解了本意,搞得委员噤若寒蝉,不敢说了。”

另外,他说:“有些专业性较强的代表委员,可能对有些社会敏感问题不了解,他们不想轻易发表意见。”

但在一定意义上,媒体关注的就是公众关注的。在公众对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能力期望值较高的情况下,对于难开尊口的代表委员,公众还是颇有微词,“酱油委员”的称号就由此而生。

说大实话 掌声雷动

一句流行语在两会出现了,“企业界的抢着说,高官们围着说,‘酱油委员’没话说。”但不管以何种方式,当站在镜头、话筒前,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时,“为谁说话”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审议发言提到物价飞涨时说:“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言语间真情难抑,数度哽咽,当场引发多次掌声。网友取贺优琳名字谐音,力挺其为“忧民哥”。

贺优琳发言时提出4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二是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少用“让”字,比如“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等,一个“让”字,好像是恩赐,人民理应享受更多实惠。

这位基层代表的发言结束后掌声雷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称赞他讲的是“大实话”。

无独有偶。3月8日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中,香港全国政协委员潘祖尧题为“城市建设的隐忧”的发言,历数大陆城市建设的弊端,不足9分钟引发10次掌声,得到的评价也是,“他说了大实话。”

为民请命,敢于说真话、实在话,这是亿万百姓对代表委员的期待。但历数每年两会,被“拍砖”的言论频频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去年提出丈夫应给妻子发工资的提案,成为当年“雷人提案”之一。今年她又提出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并建议为经期女性放假,被不少媒体称为“语不惊人死不休”。

刘翔今年在参加小组讨论发言时谈起自己的脚伤以及训练情况,当即被批为没有尽到履职责任,“你是来尽政协委员职责参政议政的,而不是汇报工作的”。体育界一位委员认为,应该区分本职工作和履职的差别。

“完全赞成”“很激动”“很受鼓舞”“很有意义”……这些话语被有些媒体记者归纳为“发言必备词”。

“我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全国两会报道,很少听到有人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质询。”一位中央媒体的记者说,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亟待提高,“他们还不习惯于理直气壮地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

说的不在多 要在点子上

如果“说”是一种中国式议政的重要方式,那么“怎么说”,就关系到议政的效果如何。

“委员履行职能的方式有很多种,提案、大会发言、参与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组副组长刘晓冰说,提案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履行职责最熟悉、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3月5日,医卫界讨论小组上演了一场口水战。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提出,要重视发展中医药,提高中药价格。此言引起现场不少人非议。

“你这话是不是讲,要发展中医药就得提价?让中药的价格跟进口西药一样贵了,是不是中医就发展起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

而后,他感叹,为什么不少提案得不到有效回复,“要么提的不在理,要么提的不具体”。比如提出要发展中医药,但是却没有一个合理的具体的措施,这就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因为像这样的笼统概括的提案太多了。”

黄洁夫认为,不用每年都提很多提案,坚持把一个提案做到点子上,坚持提下去,就够了。“如果每个委员精心做一个提案,每年就是5000多个。”

连续多年提一提案的委员不在少数。“这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之一。”王超斌说,比如免除农业税、免除九年义务教育费等,这些年他都参与过联名提案,连续提了多年,后来终于取得成功。

要真正像 家里人说话一样

各省市代表团的开放日,更能展现出地方高官“说”的艺术。有人保守严谨,有人开明活跃,有人诙谐幽默,往往在答记者问环节展露无遗。

今年广东团开放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妙语连珠。他一句打趣欧广源的话就表明了广东对“推普废粤”的态度。他对在座的代表和记者说:“你们有多少人能听懂欧广源主任的话?如果没听懂,谁还敢说推普废粤?”打趣中,巧妙给以回答。

当记者问他广东将要培养什么新产业时,汪洋在回答的末尾引用赵本山在春晚小品中的台词,“此处省略5000个字”,让记者们意犹未尽。

“最好有人激烈地争论,我喜欢这样的现场。”台湾一媒体记者黄欣(化名)说,这让她感觉到民主的气氛很浓郁。两会给她的感觉是温和的讨论多,激烈的争论少,听起来不过瘾。

但她感觉到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新闻发布会多了。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统一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每年递增,今年,全国政协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就有8场。

两会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始于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此后,一直延续至今。

1991年6月,李鹏同志受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周觉的邀请,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参加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至此,记者招待会的规格与级别均达到了一个高峰。除了1992年两会总理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外,从1993年开始,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就常态化、制度化了。

“这是一种‘言说’的姿态,也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民主形式,国家领导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荣海说,“要真正像家里人一样讲话,把中国的事儿当做自己家里人的事。目前,两会的气氛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跑会这活儿……

“新闻大战”背后的媒体气质

文/本报记者 董钊 刘爽 李萌博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会掀起一场新闻大战。媒体如何突破重重壁垒逮“大鱼”,逮什么样的“大鱼”,提什么样的问题,都透出媒体的价值取向和各自的气质。

证件证件还是证件

3月9日中午,新华社摄影记者姚大伟坐在办公室里,多少显得有些疲惫。从1993年开始,几乎每年春天,他都要拿起相机,将镜头对准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段时间,是他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作完政府工作报告后,走回座位。在他身边,掌声雷动。姚大伟迅速按下快门,《满意的答卷》这幅摄影作品因此诞生。

“同样的大会,同样的场景,求新很不容易。”最近十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姚大伟这样的老记也时时感受着来自全国各地各级媒体记者的挑战和压力。

姚大伟的工作职责是中央新闻报道,他曾陪同温总理前往汶川地震灾区和南方雪灾第一线,也曾拍摄了上海APEC元首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他的胸前,挂着参加此次全国两会的两张记者证,这为他穿梭于人大和政协会议提供了便利。

这两张证件,并非每一位“跑会”记者都能拿到。而这两张证件也是有讲究的,比如,挂人大证的记者一般可以参加政协的新闻发布会,而挂政协证件的记者有时就不能参加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但如果人大和政协的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地方开,大家就可以借机“串串门”了。

不过,除了新华社、央视等有限几家中央级媒体,很多记者是连一张证都求之不得的。于是,无证的记者就只能“扫”马路新闻,到宾馆门口堵委员代表、到网站听现场访谈、看着人民大会堂大门流口水——这中间大概隔着一公里的距离。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翟磊已经是第五年参加全国两会报道了,他的感受是“有证的记者越来越多了”,去年可以说几乎平均一个记者采访一名代表或委员。

而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今年两会期间,报名注册的境内记者约3000人,而活动在会议和驻地周边的非注册记者,数量应该比3000人要多。

位于北京西二环附近的职工之家宾馆,是山东、安徽、陕西、福建等代表团的住地。和其他住地一样,每天经过大门的人员都要接受武警、保安、公安的检查——在大门口接受证件检查,宾馆旋转门前证件接受仪器检查,然后接受对携带物品的安检。

在“职工之家”门口的登记处,不时会有年轻人等着“被领”,他们大多是前来采访的记者,只是没有进出住地的证件,要想进入,必须和要采访的代表委员约好,由代表委员出面登记,再出来“领人”。

3月7日中午,某省级媒体的一位记者提着外卖来到代表住地的一楼大堂,他的同事正在采访人大代表,中午不能外出,“如果出去的话,还得让代表去领,比较麻烦,干脆不出去了。”

执着的“黑户”们

3月1日,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大幕,比委员代表动身更早的是一大批地方媒体记者,许多委员代表住地附近的宾馆房源比往日更加紧俏。

在北京一个休闲式书店,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聚在这里,他们中多数没有大会颁发的采访证件。在这里,他们相互交换名片,询问着各自的采访资源,以期共享。

“我已经连续三年采访全国两会,今年还是没有证。”某省级媒体记者说。为了更好地打听各住地的消息和会议进程,不少记者在这里,一起建立了一个QQ群,这样可以方便地问到某个代表或者委员的住地、房间号甚至电话号码。

没有采访证件,进入委员代表住地就要费周折,“我们不能去现场找代表,只能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提前预约。人家如果忙,我们只有等。”

有一次,一位无证记者老远就冲着一位代表笑得“很亲切”,代表以为是老朋友,赶紧快步走过来,可到跟前一看,不认识。记者笑得更甜了:“我也是咱们省里的记者,没有证,您把我带进去吧。”

某国家级专业类杂志的记者说,他做了多年的采访报道,一直没有正式的采访证。“你看,我就带着访客证,每天早晨我都找代表或者委员往住地带啊,平时采访的人可以发展成朋友,朋友带你进来没什么困难的。”

“当然,也不好意思一天找人好几遍,只要上午进来了我一般就不出去了,一整天都待在这里面。中午吃饭不重要,可以提前去超市买瓶牛奶和一袋饼干,就打发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们的工作远未结束,他们又要开始写作或者编辑。9日,在休息间歇,一位记者抱怨说:“我几乎每天凌晨三点睡觉,早晨八点起床,觉得累得不行了。上午来这边看到两位代表,本应该上去采访一下,但是我实在很累,就没上去回。”

被“信息饥渴”折磨

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刘世昕最早采访全国两会是在2003年。这几年来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有一年他和同事发现很多部长都从住地北门走,那也是闲聊时他偶然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说的。

“我们去堵一些平时很难见到的部长,结果真的就采访到了很多部长,搞了不少独家报道,这一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可是第二年,这个秘密就被许多媒体知道了。再后来,官方就专门设置了发布台,请部长专门答记者问。”

“平日里做个采访,别说省部级官员,就是厅级、处级干部也不是想采访就能采访得着的。但是在这里就可以近距离接触,这样的机会谁不想抓住!”一位平日里被“信息饥渴”折磨的省内媒体同行感叹。

于是,记者们在两会上各显神通,“假摔”、“碰瓷”、“绑架”……甚至女记者冲进男厕所的招数也都使了出来。

3月6日,在李肇星代表参加的分组审议现场,一名记者躬身过去递上名片,提出采访的请求,可当时另外一名代表正在发言,李肇星微笑着予以婉拒。但是这位记者并未死心,直等李肇星离席出门,又快步追了上去,继续“纠缠”。

200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一名地方媒体女记者想采访吴敬琏,可一直等不到机会。会议中间,老先生终于忍不住了,要去厕所,这名女记者就尾随其后,与另外两名女记者追进了男厕所。老先生被堵在厕所门口,进也不是,出也不是,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在外策应的记者拖来一把椅子,摆在厕所门口,把吴敬琏摁到椅子上就采访。直到全都问完,目的达到,才放老先生去厕所痛快了一把。

然而,对于媒体记者来说,面对五千多名代表委员,要准确找到一个素未谋面的采访对象,确实不易。在采访现场,不时有记者感慨:“难在不是问什么,而是怎么认人。”

就为了能在快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几千人中一眼认出某部长、某省长,有些媒体会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对上会记者“集训”——对着照片认人。而一些长期跑两会的记者,几乎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见了大鱼还得抓住大鱼。每次开会时,一些媒体会派出漂亮女记者打头阵——对面部长走来了,一位女记者会立刻冲上去,亲热地搀住胳膊,另外一位女记者赶紧一伸腿,绊住,后面就会有两位女记者同时冲过来,拉住就往一边跑,此时部长再想走,已经晚了,长枪短炮已经堵在了胸膛上,而且人会越聚越多,形成一个包围圈。

为了绊住部长,必要时女记者连“苦肉计”都要使。一位女记者就曾为了拦住一位省级大员,假装摔下楼梯——可她不小心,真的摔了下去。于是,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她旁边的十几个人都接连摔倒,本子、采访笔、相机撒了一地。

3月9日,在陕西代表团住地,一位人大代表与两名记者正侃侃而谈。这时有记者走过去,看看代表的出席证,然后打开手机上网,迅速输入这位代表的名字,职务和身份就一目了然。

然而,如果没有事先准备,随机采访就不允许记者有充足的时间上网查询了。在山东团分组审议结束后,几名人大代表被记者围住,其他在场的记者见状迅速围了过去,将录音笔递了上去,等回答结束后,仍有记者问:“这位是谁啊?”

然而,由于案头工作不充分或者对相关领域非常陌生,也有记者即使找到了采访对象,也一时不知从何问起。

翟磊说:“两会中有些记者采访中问一些问题,比较浅显,问不到点子上,没有自己的特点和声音。”

“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一位部长与你擦肩而过,你能迅速反应出该问他什么问题,并且成功抛出至少一个提问。”刘世昕说。

应对媒体 是现代官员的基本功

——本报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

本报记者 董钊 刘爽 李萌博

一年一次的全国两会,一直是媒体竞逐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媒体在两会报道中应保持关注大局的姿态,而提升面对媒体时的能力,已逐渐成为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基本要求。

媒体对一些有深刻思考的委员代表关注不够

齐鲁晚报:*两会的注册记者越来越多,非注册的两会记者也不少,这说明媒体参与两会这样的政治盛会的热情明显高涨。*

喻国明:其实,媒体要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无非两样,一是事实,一个是意见。参与者越多,事实就会表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迅速,意见就会表达得越来越多样化,这是好事。有些东西刚开始可能是表面化的,但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也许就会很活跃,很有效,并且会有自己的内容。

齐鲁晚报:*媒体传出的两会声音很多样,在两会报道中,如何做才是媒体真正的担当?*

喻国明:现在媒体多了,表达的方式多了,各种利益集团都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各种利益表达和意见表达需要一个平衡者。如果某些利益集团意见表达相对弱一些,或者被忽略了,我们要调集某些力量扶持一下。

再者,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它必须提出值得社会关注的最重大问题,要以社会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去建立角色,而不是以自身的商业利益为最高考量。

齐鲁晚报:*在对两会的报道上,还有哪些值得媒体思考?*

喻国明:在两会上,媒体对于官员、明星的报道相对来说比较扎堆,对于一些有深刻思考的委员代表关注得还不够。一个明星代表委员,你只要拍一张照片,说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吸引人的姿态就足够了,但这并不是两会报道中重要的东西。大局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讨论大政方针,要抓住要害,不能表面热闹

齐鲁晚报:*您个人比较关心两会中的哪些内容?*

喻国明:我比较关注“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目标制定,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上的转型,比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这些重大的利益调整做不好,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小恩小惠,都不能解决问题。

齐鲁晚报:*民众和媒体对两会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说明了什么?*

喻国明:媒体对两会的信息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参政热情提高。这也要求官员对于现实存在的问题要有深刻理解和把握能力。在讨论国家大政方针时,抓住真正问题关键点,而不是被一些边缘的东西牵制,使这些大政方针成为一场看似热闹,但却并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

官员必须学会利用媒体跟社会对话交流

齐鲁晚报:*媒体和两会两者之间怎样才能达到良性互动?*

喻国明:官员也好,代表也好,向媒体表达观点是权利行使的一种重要手段,必须学会利用这种手段跟社会进行对话、交流,让社会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把很多民间智慧吸纳到决策的制定中来。

齐鲁晚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不同的代表委员有不同的态度,有的知无不言,有的相对谨慎,有的保持沉默。*

喻国明:有些代表委员尤其是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代表委员相对会谨慎一些,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民意代表,他还有实质性的工作岗位,他的话语表达对社会的影响大,他的谨慎本身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用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媒体。

实际上,有些人在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才不愿意或不敢面对媒体。但是,提升面对媒体的能力,是现代型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基本功,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其实是不适应作为执政角色的这种要求的。